

■ 何兹全 主编

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曾子研究

——附《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注释

罗新慧 著



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子研究:附《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注译/罗
新慧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8613-4

I. ①曾… II. ①罗… III. ①曾子(前 505~
前 43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3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
重点资助项目**

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曾子研究

——附《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注译

罗新慧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13-4

2013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33.00元

总 序

何 兹 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

2 曾子研究

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视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

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地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撰这套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目 录

绪论	论曾子	1
一	曾子及其时代	1
二	曾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5
	(一)曾子对于孔子道德范畴的全面继承	5
	(二)“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与曾子思想体系的形成	8
	(三)曾子理论与儒学发展方向	16
三	曾子学说的基本特点	19
四	曾子的历史地位	28
第一章	曾子家世及生平考析	42
一	曾子家世考	42
	(一)曾子世系	42
	(二)曾参故里——武城考	46
	(三)曾子家庭考析	56
二	曾子生平考	62
第二章	曾子时代的士与儒士	74
一	曾子时代的士	74
二	曾子时代的儒士	81
	(一)关于儒士的身份问题	81

2 曾子研究

(二)儒士并非完全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	84
(三)关于“士无定主”	87
第三章 曾子著述考	92
一 《曾子》考	92
(一)《曾子》一书的流传情况	92
(二)《曾子》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94
(三)《曾子》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考	97
(四)从上博简《内礼》看《曾子》的成书	103
二 曾子与《孝经》	118
(一)曾子对于儒家孝道理论的发展与	
《孝经》主体思想的形成	120
(二)曾子—孟子—《孝经》	124
(三)从《孝经》成书看儒家传统孝道的衍变	129
三 曾子与《大学》	134
第四章 曾子关于理想人格及修养方法的探求	141
一 曾子对理想人格的设定	141
二 曾子的修心理论	150
第五章 曾子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	160
一 曾子关于“仁”的探讨	160
二 曾子关于“礼”的探讨	170
三 曾子伦理学说的特点	176
第六章 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及其社会意义	179
一 曾子对于传统孝道的发展	179
二 曾子孝道理论的意义	193

三 曾子孝道理论的时代特征	196
第七章 曾子的阴阳学说及其与《易传》的关系	203
一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的作者及写定时代	203
二 曾子思想与阴阳学说	206
(一) 曾子论“阴阳”	207
(二) 阴阳学说与儒家理论阵地的扩展	210
(三) 曾子的天圆地方观念	215
三 儒家思想的发展与《易传》成书的关系	218
(一) 儒家《易》论源流	219
(二) 曾子对于儒家《易》论的贡献	224
(三) 《易传》思想的学派归属问题	233
参考文献	238
附:《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注译	241
曾子立事	242
曾子本孝	294
曾子立孝	302
曾子大孝	311
曾子事父母	326
曾子制言(上)	337
曾子制言(中)	354
曾子制言(下)	367
曾子疾病	375
曾子天圆	385

绪论 论曾子

曾子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对于儒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意欲在绪论部分对曾子思想先做一个鸟瞰式的说明,然后再分章节转入专题研究。

一 曾子及其时代

曾子,名参,春秋战国之际鲁国武城人,孔门著名的贤弟子,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学术传承者与发展者。

孔子歿后,儒家学派失去核心,这以后近百年时间中,儒家学派内未能出现一位能够与孔子差堪比拟的学术大师,儒家思想暂时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低谷阶段。大师逝去,留下巨大的思想与理论空虚,从下面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儒家弟子此际的彷徨与无奈: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①

^① 《孟子·滕文公上》。

2 曾子研究

为孔子守三年之丧,充分显现出弟子对于其师逝去的无比哀伤与怀念。他们之所以欲树立有若为师,不仅在于有若貌似孔子,而且更在于,孔子逝去之后,孔门急需有人填补空虚,以领袖的力量来团结、稳固儒家学派,以适应时事之变。此事最终遭曾子拒绝而作罢。曾子清楚地知道盲目崇拜偶像,对于填补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巨大空虚,于事无补。曾子认为圣人——孔子的高风亮节,伟岸绝伦,其洁白高远犹如濯之江汉、暴之秋阳一样,一般人怎么能够与之比肩呢?

孔子辞世于一个对于旧传统、旧秩序而言可谓风雨如磐的历史时期。他去世的时候鲁国三桓执国政,晋国六卿擅权,新旧更替的社会局面的出现已势不可当。他去世前两年(前481年),齐国已经奠定了田氏代齐的大局,孔子去世的那一年,各国祸乱频仍,卫国出现孔悝之乱,楚国白公胜之乱则使得楚王室岌岌可危。再看孔门弟子在茅庐里面为其师守丧的三年中,社会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卫庄公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帮他夺取政权的浑良夫,然而须臾间他自己却被造反的民众杀死;越国出兵大败一度强悍无比的吴国;晋卿赵鞅率军围攻卫国,卫得齐救才免于城破国灭的危险;楚灭掉历史悠久的陈国;宋国贵族内部争夺田邑,竟迫使居于高位的右师皇瑗离宋奔晋。鲁哀公十八年(前477年),宋右师皇瑗返宋被杀;强大的楚国遭巴攻伐;卫国君主名起者被臣下逐出,以前曾逃往齐国避难的卫君回归复辟。鲁哀公十九年(前476年),越故意攻楚,以使吴国放松警惕;楚国出兵讨伐东夷;周敬王死,鲁派叔青至周参加葬礼。就是在孔门弟子蜗居守丧的这三年中,社会上正发生着光怪陆离的变化。孔门弟

子步出守丧茅庐之时，一定会对世事之巨大变迁感慨不已：孔子所设计的政治理想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而社会本身却正在向着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结合新的社会环境对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进行整理、总结，以适应新的历史发展的需要，便成为孔门弟子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子张等人急于抬高有若，当出于这种急迫而复杂的心情。

还应当指出的是，儒家宗师孔子虽已逝去，但是社会对于儒家弟子和儒家理论的需要却有增无减。孔子去世后翌年所发生的齐、鲁两国诸侯会见时的礼仪之争，即为显例。《左传》载：

公会齐侯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①

齐、鲁两国诸侯会见时，对于周礼不甚了了的齐平公向鲁哀公叩头，而鲁哀公仅向齐平公弯腰作揖。按照周礼，诸侯只向周天子行稽首礼，所以鲁哀公之举合乎周礼，齐平公叩头，明显是让鲁人在外交礼节上占了上风。给鲁哀公相礼的孟武伯据礼而凿凿有据，所以齐人无可奈何，只能自甘出丑。孟武伯是孟僖子的孙子，孟僖子曾经因自己不能相礼而发愤让子弟向孔子习礼，其事见诸《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

^① 《左传》哀公十七年。

4 曾子研究

倮，再命而伋，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嬖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自孟僖子之后，孟氏子弟随孔子习礼，到了孟武伯的时候果然发挥了作用，在齐、鲁两国君主相会时，据礼而胜出齐国一筹，使齐人大失颜面。此事过了三四年，齐人还愤愤不平，责备鲁君没有行稽首礼之事，并且作歌道：

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①
齐人所说的“儒书”应当就是记载礼仪的儒家典籍。众多的儒家弟子周旋于多种外交场合，以其学识任职于鲁国各个部门，他们精通儒书，熟谙各种礼数仪节，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不言而喻。鲁国君主之所以对于孔子比较敬重，与许多博学多才的儒家弟子服务于鲁有直接关系。孔子死后，鲁哀公致悼词谓：“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莪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②这个悼词尽管被儒家弟子指出有不妥非礼之处，但是，鲁哀公对于孔子逝去的哀痛之情还可谓溢于言表，这说明孔子所建立的学说对鲁国的政治尚起到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

总之，无论是儒家理论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抑或是社会对于

①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

② 《左传》哀公十六年。

儒学思想的需求,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说亟待进一步的总结、深化。

随着孔子的逝去,这一历史使命,便落在孔门弟子的肩上。然而,仔细分析孔门诸弟子情况,则可以说,堪当传承孔学重任者,当以曾子为是。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①表现出曾子对于理想追求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从曾子思想发展脉络看,也正是曾子在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发展和理论建树方面起到了中坚作用,正是由于曾子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学没有处于静止、停滞状态,而是活水涌动,能量积贮,传承与发展生生不息,步入继往开来的新阶段。正是借助这一阶段的酝酿和铺垫,儒家学派至孟子时代才又登上另一座思想高峰。而曾子则可谓连接两座思想高峰的中介,在思想学说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先秦儒家薪尽火传,代不乏人,曾子于其间可谓作用大焉。

二 曾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曾子承孔学之浇漓,于孔子学说夙有心得。他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从宏观角度而言,至少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 曾子对于孔子道德范畴的全面继承

孔子是周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上承西周文化,总结性地提出

^① 《论语·泰伯》。

了诸多有恒久价值的道德概念,如仁、义、礼、孝、君子、士等等,这些传统的概念经过孔子重新诠释和发挥,以新的内涵出现于世人的面前,遂成为儒家学说中的精华,并且影响深远,垂及后世。在曾子的思想学说中,完全保留了孔子的道德范畴,并且有所发挥,如曾子谓:

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①

这里,曾子将孔子道德范畴中的“仁”与“义”并举,直接开启了孟子的仁义学说。再如曾子讲孝的一段言论: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②

这里,曾子突出强调了孔子道德概念中“礼”与“忠”的作用。再如,曾子有著名论断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③

曾子极其庄重地道出了士人以“仁”为责任的豪迈气概。可以说,曾子所运用的许多道德概念,其中蕴含的精神都深契于孔子的思想宗旨。虽然曾子学说中的道德范畴未能超越孔子思想体系,并且没有抽象和概括出新的命题,但是作为孔、孟两大思想高峰的中介,曾子思想却是当之无愧的。例如关于人们思考的层次与修身的本质问题,孔子曾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④,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⑤,对于“非礼”之事,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大戴礼记·曾子立孝》。

③ 《论语·泰伯》。

④ 《论语·里仁》。

⑤ 《论语·颜渊》。

孔子提到视、听、言、动四者，但对于内在深层的“思”却避而不谈，那么，对于非礼之事能不能“勿思”呢？曾子则指出：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①

在这里，曾子不仅划分了修身的层次，确定了内在之心为思想的本质，并且明确提出“心思勿为不可能也”的论断。可见曾子较孔子进一步肯定了“思”为修身的根本所在。但是，应当怎样思呢？曾子虽然有内省体察的修养学说，但却未上升到命题的高度。孟子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发挥，谓：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②

孟子提出了“心之官则思”这一著名命题，不仅如此，孟子还进一步提出思的原则——“诚”。他说：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③

汉儒赵岐谓“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诚为贵也”^④。可以看

①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② 《孟子·告子上》。

③ 《孟子·离娄上》。

④ 赵岐：《孟子章指》，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1—512页。

出,曾子提出了实践与思的关系问题,并且主张从内心深处下工夫,但其学说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心性、本体等问题,只是到了善言本体的孟子才深入发挥,提出了“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和儒家重要的道德伦理概念——“诚”。然而,曾子关于思行关系的言论则在实际上开启了孟子的相关学说。概括而言,在理论范畴方面,曾子可谓全面继承了孔子的学说,而没有大的超越,但在方法论方面,儒家传统却在曾子这里获得一次最有系统的整理与发挥。这也就是我们下面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二) “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与曾子思想体系的形成

方法论是思想理论中的灵魂,只有掌握这一动态因素,思想本身方能够离开来于继往。曾子对于孔子方法论的继承与发挥是其学说中至为关键的一部分。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一以贯之”为其重要的思想脉络。《论语·里仁》篇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为曾子亲聆孔子讲述“一以贯之”。据《论语·卫灵公》篇所记,子贡也曾聆听孔子讲述“一以贯之”之道: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此为孔子教诲子贡以“一以贯之”之方。孔子一再提及“一以贯之”,可见,此道于孔子而言当有深意在焉。然而,“一以贯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孔子并未明言,故自汉以降,向为经生争辩之端,

各家之说当中不乏持之有故、富于启迪意义者。今择若干有代表性的见解，撮其大意，概述如下：

何晏注谓：“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①何晏所说的“元”，就是开始之义，亦即事物的本源。何晏强调了万事万物均可归纳于一，认为此即“一以贯之”。

朱熹谓：“一以贯之，犹言以心应万事。……或问理一分殊，曰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盖曾子知万事各有一理，而未知万理本乎一理。故圣人指以语之。曾子未闻一贯之前，见圣人千头万绪都好，不知皆是此一心做来。及圣人告之，方知皆以此一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万叶都是此根本上生气流注去贯也。”^②朱子以“理”、以“心”为万事万物之根本，又以为“心”可以融会贯通万物。

其三，王夫之谓：“‘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者’，若将一粒粟种下，生出无数粟来，既天理之自然，亦圣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则是将太仓之粟倒并作一粒，天地之间，既无此理，亦无此事。”^③这里所说的“同归殊途，一致百虑”与上引何晏语所涉及者，均出于《易·系辞》“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不同的是，何晏侧重于万物均可归纳于一，而王夫之则强调本根，以为由根本出发同归而至于殊途，由一而致于百虑，

① 何晏：《论语注疏》卷十五，诸子集成本。

②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